



■ 香山慈幼院创始人熊希龄

大家庭住在哪?熊希龄看上了香山静宜园。静宜园曾是清朝皇帝的行宫,占地千亩,有房舍三千余间。当时,这里还是退位的清皇室的私产,虽年久失修,但背倚西山,怀抱幽谷,占尽风光。

为了促成此事,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亲自与清皇室商量,将其永久借用。作为回报,220名八旗破落子弟成了香山慈幼院的第一批学员。

1920年10月,千人规模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。开办经费主要来源于两处:政府拨出12万现洋作为建院专款,5万余元作为基金;水灾募捐余款中,拨出64万元。其中,建院花费了27万元。

除了破落八旗子弟,早期的学生主要是水灾遗孤,以及在河北地区实地走访发现的孤、贫儿。至于招收标准,“家里七八个人穿一条裤子的,是一定要收的”。此后,又陆续收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苦孩子。

建院之初,孩子们几乎人人带病,每日住院的就有四五个,门诊百余人。协和医院统计,900儿童中竟有700

患有沙眼。

慈幼院不仅请女红十字会出面创办了香山医院,还请名医施今墨担任副院长,免费出诊。生病的孩子在见心斋把身体养好,脸色红润起来,才分到各班参加学习。

学校还引导孩子们培养严格的卫生习惯。方亨告诉记者,蒙养园的保健措施极严。每晚洗漱后,大孩子要给小孩子拂去身上的灰尘,才能上床。孩子们的营养也好,每天都有豆浆、鸡蛋,身体弱的还能喝到牛奶。到了夏天,一碗糖拌西红柿,胜过防病的小药。

培养“健全国民”

1921年底,慈幼院基金总额达到100余万元。熊希龄作为民国第一流的财政家,信心满满地认为,以自己的理财能力,这笔钱足够1000个孩子的生活。

但1925年以后,随着政局更迭,一些账面拨款和承诺资金成了空头支票,慈幼院每年少收入了十几万大洋。就在这时,男生部又发生了一场大火,总计烧毁房屋200余间。熊希龄老泪纵横,香慈元气大伤。

1929年,香山慈幼院遭遇了建院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,1700余名儿童几乎要断顿了。幸得冯玉祥资助,才吃上黑面馒头。此后,资金问题一直是香慈的头号难题。

为了争取三教九流的捐款,熊希龄分别从佛教、基督教、儒教的教义里寻找依据。他还到处上书,称“儿童教育能普及者,其国必强”,希望引起政府重视。但纵然奔走呼号,筹款还是日渐艰难。

1932年,熊希龄的夫人去世。为了纪念亡妻,更为了解香慈的燃眉之急,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,共计大洋27.5万余元、白银6.2万两。举国为

之动容。

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,洛林这一年进入香山慈幼院时,才能在内忧外患中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

王春宜的父亲王在湘是熊希龄的助手,他自己也是香山慈幼院的毕业生。他告诉记者,香慈的理念是对每个儿童负责到底。为了给他们的将来提供一条出路,熊希龄还在东北买了大块的荒地,准备建一个垦荒农场,和孩子们继续生活在一处,耕田织布。

但熊希龄并不满足于让孩子们有家庭、受教育和有工作。他认为,孩子们必须具备公民常识,才可算是“健全国民”。

熊希龄早年在日本考察时,看见中国留学生每次开会都互相打骂,飞墨盘,踢桌子。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开幕时,这些留学生有的成了议员,但仍然不守秩序。熊希龄悟出,良好的公德,是儿时养成的。

起初,为了让孩子们成为“健全国民”,香山慈幼院搞起了“学生自治”,由学生组成议会、审判所、警察所,自行管理校园事务。慈幼院还定期选举“市长”,演说拉票。

“学生自治”实施了一段时间,熊希龄发现这种形式对小孩子来说太耗精力。他及时纠正了这种做法,转而制定了《儿童习礼法》《儿童劳动法》和《儿童治家法》,从细节上规范儿童的行为。

比如,吃完饭,筷子不可放桌子上,一定要轻轻放在碗上,再向同席的人告退。这些儿时习得的生活细节,洛林和方亨遵守了一辈子。

香慈远去

战火,最终摧毁了香山脚下的世外桃源。

1937年7月7日,是香山慈幼院

一年一度的“回家节”。已毕业或者成年的孩子,本该返回香山,欢聚一堂。只是这一天,卢沟桥的战火让节日变成了祭日。

方亨还记得,那天老师教的是《最后一课》。

困居上海的熊希龄,忧心忡忡,希望将困在北平的香慈师生接到南方。然而战火迅速蔓延,使迁校成为不可能。

这一年的12月24日,避难香港的熊希龄在打坐中去世,死时身无长物。丧葬全靠其继妻毛彦文借贷办理。

此后,香山慈幼院经费中断,家产变卖殆尽。依靠代理院长胡恩光的苦心经营,才勉强在日伪时期保存下来。

1939年,洛林在晨曦中离开了香慈下属的师范学院,奔赴抗日前线。她还记得,自己对送行的方亨说:“好了!暂时离别又何妨?”没想到,这一别,与香慈竟是永诀。

抗战胜利,熊希龄继妻毛彦文归来,主持香山慈幼院。当年熊希龄与毛彦文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,曾引起轰动。熊希龄说,他不仅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晚年的伴侣,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个稳妥的继承人。

毛彦文决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香慈的事业上,“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”。为了筹款,这位民国名媛频繁地拜访各方政要,“沿门托钵,过着化缘的日子”,广受赞誉,也饱受冷眼。但是,香慈已经难拾往日辉煌了。

苦撑到了北平解放前夕,中共中央找慈幼院借用香山校舍,时任副院长雷动和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一个条件:“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,如要借用,需给与妥善安置。”

1949年3月,解放军派出一个汽车团,用了半个月的时间,将慈幼院迁

入新址。

毛泽东在入住熊希龄故居双清别墅时,曾动情地提到:“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,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。熊希龄做过许多好事。”北京市领导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招待全体师生,感谢他们为中共中央腾出了3000多间房间。

1954年,香山慈幼院再次搬家,校舍变成苏联式的,生源也发生了变化。“都解放了,哪能还有孤儿?”受此思想影响,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干部子弟学校。与众不同的是,这是北京唯一一所名义上的私立学校。

“文革”期间,“造反派”一把大火,香慈所有史料文件焚烧殆尽。1973年1月,香山慈幼院改名为北京立新学校,意为“破旧立新”。

香慈自此永远消失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洛林和一些香慈老人们开始回过头来,研究香慈校史,研究院院长熊希龄。

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聚在一处,1992年,熊希龄骨灰归葬香山。

儿时的伙伴再相聚时,已是白发苍苍。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。

同游香山时,看到昭庙,他们说,那是校医院;见心斋,是慈幼院幼稚师范;香山饭店,是他们的住处。香山风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,是香慈总部“镇芳楼”。它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,只不过上面多了一颗红五星。

接受记者采访时,洛林随口哼起了她最爱唱的“饭后歌”。歌词前半是冯玉祥在香慈吃饭时随口念的,后半是熊希龄写的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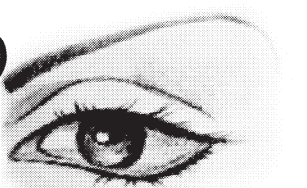
馒头棒子豆芽汤,蒸蒸日上香;如今生活比天堂,精神体魄强;堂以外,可心伤,穷孩满四乡;如何救彼出饥荒,时时不可忘。

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3年第5期

《美容达人讲堂》/Beauty Classroom

文/张维

成功人士追求美丽的心情与心态?



容貌美丽与帅气是继社会地位、金钱之后的另外一个成功的标志。良好的形象,可以愉悦自己、感染它人,追求美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中国整容人群的变化由原来的六大整容群体,暨先天性畸形和后天外伤,其次是艺人,现在则变为:艺人、上流女士、年轻求职者等。共同的要求是:一要绝对保密;二要恢复期短;三是一次不能改动太大,一种渐变美丽。

改革开放三十年,美容行业的求美人群构成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,过去由艺人、空姐、模特,上流女士为主,如今已经发展到许多成功人士和商界精英,其中不乏许多男性顾客。男性顾客的比例大约占2成。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索“名媛美容”,很快便出现40余万条信息。经观察发现,商界名流和成功人士美容的目的,为了增加自信和活力。他们求美的过程和表现也很不同,具有以下三个特点:一要绝对保密;二是一次不能改动不能太大;三要恢复期短。

一、注重隐私

选择有档次、保密性强的美容机构很重要。美容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,并非健康所必须,因此自己可以选择美容机构、选择时间、选择信任的美容师傅。但是为了保密起见,可以选择一家设备好、技术过硬、工作时间灵活的服务机构更为理想。在接待或美容时,整个工作室可以清场,不受外界干扰。接待或手术的时间可以预约在非繁忙时间段(比如晚上)。甚至,有可以隐蔽出入的后门更为理想(提醒:有隐私需求者,可以电话里向工作人员说明,,提出自己要求,以便于安排)。这样就可以基本上保证你隐私问题。

二、美丽渐变

研究发现,名媛成功人士美容与大众有些不同:“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0到60岁之间,想年轻也想美,但又怕别人发现他的变化。”这些成功人士在美容进行中,还不时嘱咐美容工作人员:“改动一定不要太大,稍微动动就好,别让大家看出来。”这种想法“与艺人美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,成功人士们美容最想要的结果是“没有变化的变化”。当然我这里所说的“没有变化”不是不变,而是在自然中求得变化,是一种渐变,但是追求美丽和年轻化的目标,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

三、快速恢复

名媛与成功人士美容,另一个需求是恢复期一定要短。

(一)灵犀双眸 倾国倾城
中国古代文人对美女眼睛的描写虚多实,或是注重眼睛的魅力“一顾倾人城,再顾倾人国”;“明眸善睐”,“目流睇而横波”。《红楼梦》中对美女眼睛的描写有“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”(林黛玉)、“眼如秋水”(薛宝钗)、“一双丹凤三角眼”(凤姐)。可见,中国传统标准以杏仁眼、丹凤眼,灵动有神韵的眼睛为美,美人的眼睛如秋水、秋波,灵灵

沪医广【2012】上海新健威医疗美容门诊部 第05-24-C183号

上海新健威医疗美容门诊部

诊疗科目: 美容外科 美容皮肤科 美容牙科 地址: 淮海中路1375号10楼

联系电话

54040427